

元代教育研究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申万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元代教育研究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丛
书

Academic Library

Wuhan University

申万里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教育研究/申万里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05254-3

I. 元… II. 申…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元代 IV. G52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375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程小宜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40.5 字数: 577 千字 插页: 3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254-3/G · 887 定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

(代序)

李治安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蒙古贵族入主华夏后的文化教育状况，历来受到人们的较多关注，且毁誉臧否不一。否定元代文化教育的，当以南宋逸民郑思肖最为激烈。他抨击说：“自古夷狄凶祸之盛，土地之广，惟鞑最强最逆。上下好色贪利，如蝇见血，如蚁慕膻，灭天理，穷人欲，罔所不至。”^①数百年来，某些受汉族中心论影响的学者也持类似看法，一直以为蒙古人初无文字，文化和社会形态落后，又实行民族压迫，压抑和破坏了汉文化的发展。对元代文化教育持赞誉观点的，又以汤晓方为代表。汤女士说，元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与汉唐相比，元代文化具有更开放、兼容并蓄、吸收外来文化更广泛、影响更大等特色。^②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又都

^① 《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0 页。

^② 汤晓方：《论元朝文化的历史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 年第 5 期。

有一定的片面性。郑思肖立足于效忠南宋和排斥异族的迂腐正统观念，其政治情绪化和偏激片面的倾向，多数人不难识破。汤女士从历史大视野观察问题，提出许多有益见解，弱点是缺乏对反面材料作出分析和判断，缺乏正、反面材料的融会考辨，致使立论的说服力有所降低。

笔者认为，元代文化教育的总体情况是比较繁荣而又发展不平衡，有些部分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有些部分又有所倒退或萎缩。言其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似乎有些过头，但将其说得一团漆黑、全面倒退，又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偏见。这里，同样有因视野和出发点不同而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简单从汉族正统文化出发，元代文化教育的确受到不少压抑，甚至曾经出现某些倒退。如果主要从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着眼，元代文化教育又是建树显著、繁荣辉煌的。笔者拙见，由于蒙古贵族统一华夏，元代的文化教育没有完全沿着汉地传统王朝的模式继续前进，而是走上一条比较特殊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元世祖以后的文化教育的发展特色是：儒学独尊丧失而佛、道、科技受青睐；停科举而重学校；学校教育之中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兼容并蓄；部分蒙古、色目人汉化或儒化与部分汉人胡化的并存等等，还相应引发了儒士职业多元、儒士回归下层社会以及儒学暂时脱离科举而独立生存发展等一系列变化。正是因为这些发展特色及相应变化，上述视野和出发点不同而导致的见仁见智，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有助于问题的理解，我们特意引录一段朱元璋的说法：

昔者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来宾者甚多，效文者甚寡。自中国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备于一士，可谓之天人矣。若名能于一艺，当用之。时虽一艺不能备者，则不用焉。当是时，元得一士而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我汉儒许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人虽不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所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信

有之。^①

朱元璋曾经最早举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旗而灭元建明，也曾屡屡抨击元朝暴政和胡俗蔓延。^②但是，连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北夷元世祖入主……立纲纪，明彝伦，半去胡俗，半用华仪，中国得生全者……不三十年之间，华夷儒风竞起……昔之不效者，今识字矣”等一系列文化教育有所进取的客观事实。朱元璋如是说，是对笔者“两个比较”看法（比较繁荣而又发展不平衡，比较特殊的发展路径）的支持。也表明元代文化教育本身相当复杂，目前对它作笼统或总体的评价，都十分困难，很容易陷入一般化论说和见仁见智的争辩。与其在笼统或总体的评价方面喋喋不休，徒然耗力费神，不如做一些深入而具体的实际研究。申万里博士所撰《元代教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洋洋近50万字，就是从教育形态和教育制度的具体研究切入，透视整个元代文化教育的典范之作，也可以称得上是脚踏实地探索元代文化教育特殊发展路径的典范之作。

蒙元文教政策与教育发展历程，是《研究》的第一项重要探索。

由于蒙古军事征服和统一华夏的特殊情况，有关这方面的考察十分必要。前述元代儒学独尊丧失而佛、道、科技受青睐，停科举而重学校，学校教育之中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兼容并蓄，部分蒙古、色目人汉化或儒化与部分汉人胡化的并存等文化教育特色的发展，应该是以蒙元文教政策与教育发展历程为基本背景 and 环境的。关于这类问题，萧启庆、姚大力、丁昆健、安部健夫、赵琦等学者已经有过研究。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元代文教政策形成的角度，探讨蒙古统治者对儒学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以及有关儒士政策的产生情况。针对北方、南方教育发展的不同步性，作者将北方儒学教育的发展情况与江南教育分别考察。最后再将南

① 《明太祖文集》卷16《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

② 《明太祖实录》卷21。

北综合起来,描述蒙元教育总的发展轨迹。又特别考察边疆地区和军队的儒学教育以及地方官学以下的社学、义塾。还采取有关资料统计的办法,通过诸多数据统计和柱状图比较分析,说明元代教育发展的波状起伏和三次高潮,各地教育发展差别与不平衡以及向基层和边缘地区扩散的趋势。正如作者所云:“通过蒙古征服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化,揭示由于蒙古征服给儒学教育的发展带来的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环境。”“元朝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社会,以儒家为代表的汉文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蒙古统治者用人注重‘根脚’,并不把儒学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科举亦长期废置。在这种情况下,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如何发展的问题就非常耐人寻味。”其中,不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继续深入或超越,更有甄别诸多史料信息后的真知灼见。

教育管理、祭祀、教学等教育制度及学校建筑、学产,是《研究》的第二项重要探索。

制度,通常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规则。它是人类文明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领域的基础性的组成部分。研究元代儒学教育,自然不可能绕过相关制度。目下,历史学界盛行文化热和社会热,部分人对制度和经济之类的昔日研究重点,似乎表现出几分蔑视和冷漠。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很容易影响认识的深度与视野。作者没有赶那种时髦,而是采取了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儒学教育的相关制度做了周密细致的探讨,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比较中肯的结论或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元代逐步形成了集贤院、国子监、儒学提举司等地方行政和监察机构多层次、多渠道共同管理儒学教育的体制。自唐、宋入元,庙学合一,“由学尊庙,因庙表学”,祭祀为儒学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元代儒学的祭祀含有春秋祭丁、朔望祭祀、殿谒及乡饮酒礼等内容,甚至出现了重祭祀、轻教学的倾向。学制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学过程上重视繁琐仪式,强化对伦理和等级的认同。教学内容在继承经学教育的同时,新增适合社会需要和谋生的吏业教育等,人才培养开始摆脱科举的限制而呈现多样化。

元代生员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游学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非常盛行。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存在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与宋朝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既有庙和学总体布局的变化，也有部分建筑类型的调整，建筑布局逐步合理。学田、祭器、书籍、房产等学产，大致呈现增长的势头。据我所知，前人对元代儒学教育制度的研究，仅限于局部涉及，像作者这样系统、深入的探讨，尚属首例，很多地方大大超越了前人。

儒学学官群体及其回归下层社会，是《研究》的第三项重要探索。

元朝较早保护儒学，尤其是元世祖以后任用了不少儒士进入各级官府，在吸收汉法方面大量发挥了儒学和儒士的积极功用。还推动程朱理学上升为儒学的主导，上升为官学。但是，在蒙古统治者的眼里，儒学始终不是第一位的文化。儒学与儒士也不再是传统体制内的主导，其独尊地位已经丧失，开始被边缘化。这是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未曾有过的。元世祖以后，儒士虽然能享受儒户定籍、免除差役、选拔充当学官及儒吏等待遇，但唐、宋以来儒士赖以仕进登龙的科举迟迟未开，大多数儒士“学而优则仕”的门径被堵死。儒士充任学官之际，多数属无资品的流外职，薪俸颇低，升迁极慢，不免有“热选尽教众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类的哀叹牢骚。^①就充任学官及吏员的大多数儒士来说，其地位确实比较低。元初遗民“九儒十丐”的说法，可以反映儒学与儒士被边缘化的尴尬境遇。儒学的边缘化，带来千余年中国文化体系中一段不小的变更，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边缘化是广大儒士的灾难，它造成了儒家传统秩序、官场传统秩序的某些破坏。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尊崇，不仅八思巴蒙古字风靡全国，藏传佛教的东进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长足传播，更促使元代文化从儒学一统走向多元，部分汉人甚至发生一定程度的“胡化”。因为学儒读经的出路不佳，不少汉地精英文士转而把聪明才智投向以前备受鄙夷的市井勾栏和工巧技艺。由于儒学边缘化和科举仕途受阻，儒生士大夫

① 王义山：《稼村类稿》卷1《送余仲谦赴江州教》。

多数无法走向庙堂，只能从事学官、儒吏等下层职业，致使他们开始向基层社会发展。元后期科举重开，乡试逐渐正规，客观上又增加了儒生士大夫对基层社会的回归和亲近。这似乎是明清士大夫缙绅充任基层社会中坚的先声。

作者没有回避上述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而是用了近十万字的篇幅，详尽地探讨了北方学官和江南学官群体、学官种类、出身及经济状况、仕进、社会交往等，指出元朝的统一，对江南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大部分丧失，科举的废除，又使他们失去做官的机会，江南士大夫阶层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出于谋生的考虑和元王朝优待政策的诱导，大量的前朝士大夫开始入仕元朝，充任儒学提举、儒学教授、学正、学录等，形成了江南学官群体，反映了江南士大夫阶层社会角色的转变。元朝统一以前，北方的学官制度并不健全。统一以后，元政府逐步规范学官制度，使南北达到统一。从出身来看，元代学官主要来自儒户家庭，其中，前朝士大夫之家占了一定的比例。元代学官收入尚能维持温饱，但是受到儒学运行状况和学官升转困难的影响，元代学官的待遇仕进还是比较困难，甚至出现了学官争做地方捕盗官（巡检）的现象。北方学官的情况则相对优越。从社会网络的构建来看，元代学官的社会网络中以儒士为主，包括地方官及僧、道等方外人士，反映了他们利用社会网络改善自己处境的努力。作者还批评元代学官选用不精、素质差、缺乏资金、升转困难等弊端，其政治目的是既用学官制度笼络儒士入仕，使其承认或服从元朝统治，又对江南儒士进入中央或地方政权加以限制。

对元代学官如此详细而深入的研究，我尚未看到，不仅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也突破了教育的藩篱，进一步扩展到元代儒士乃至元代江南社会，堪称从蒙古统治的角度研究元代教育，将元代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研究。功莫大矣！功莫大矣！

个案微观剖析与宏观鸟瞰相结合，重视北方与江南的比较分析，又是《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色。

《研究》的第七章，是对庆元路儒学教育的个案研究，具体考察元代庆元路儒学教育的发展情况，以透视和展现整体上的元代教

育。他如儒学提举、儒学教授、学正等逐项专门考察，亦可归属个案研究。后者涉及源流、职掌、任职举例、出身及经济状况、仕进、社会关系网络与地位等。以上个案探研，非常具体深入，细致入微，几乎把庆元路儒学教育和儒学提举、儒学教授的相关情况及史料一网打尽。其用力之勤，功底之深，令人叹服。与此同时，《研究》在宏观鸟瞰方面，也十分到位。不仅在结语中高屋建瓴地阐述、总结了元代教育的特点及历史地位，而且还能在具体考订描述时加以理论提升，融宏观把握于微观剖析之中。譬如“元代以学官选注巡检考”，在细致考述学官任巡检的具体情况后，继续探究其原因，分析其利弊和各类社会反映，最后揭示其实质：“以学官选注巡检，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元代儒士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寥寥数语，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作者原先的计划，就是全面研究元代教育。六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我考虑到博士论文重在学术突破和前沿创新，建议作者缩小为“元代江南儒学研究”。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博士论文的出色成绩，受聘于武汉大学后，申请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探讨北方的内容，继续开展元代教育的全面研究，而且十分注重北方与江南教育的比较分析，努力探寻本质性的认识。如作者第六章论及江南学官仕进入流困难，统计其入为流官的仅有29%；又指出北方学官入流要容易很多，统计其入流比例可达到63%，有的后来还做了高官。南北学官仕进情况的差异，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的特点，北方汉人的社会地位要高于江南的南人，族群等级差别在学官仕进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经过比较分析而得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未发，自然甚为精辟。

申万里博士为人忠厚朴实，刻苦钻研。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师从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学习近代蒙古史。1999年入南开大学随我改而攻读元史方向的博士。当时，他的优势是先学近代而转学古代，可以增强贯通思维，兼之，在内蒙古大学他也曾听过周清澍等名师的元史课程，白拉都格其教授原本的专业方向又是蒙元史。不利的是，好多元史方面的史书文献需要阅读，困难颇多。但

他很能吃苦，日以继夜地读书写作，进步迅速，居然按时圆满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受到专家的好评。他的治学风格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刻苦好思，锲而不舍。他出色的博士论文和这部功力深厚、见解独到的《元代教育研究》专著，就是刻苦好思、锲而不舍的丰硕成果。

我经常在学生中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只有超过老师的学生才算是好学生。”看到申万里博士在短短七年内能够写出如此高质量的专著，我由衷地感到欣喜。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超过师辈前贤，把自己锤炼成有作为的史学家。

学海无涯，今后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即使是元代教育课题，也还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问题需要再作探研。顾炎武说：“今日人情相与，惟年社乡宗四者而已。”^①披露了明清士绅的“年社乡宗”四条社会交往的基本管道。这些情况在回归下层社会的元代儒士学官群体范围内是否适用？表现又如何？同样需要深入探索并作出科学理性的诠释。希望申万里博士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新的杰出成就。

李治安

2006年元月25日草于天津金厦里

^① 《日知录集释》卷22《社》。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刘经南
副主任委员 ▶ 卓仁禧 李文鑫 周创兵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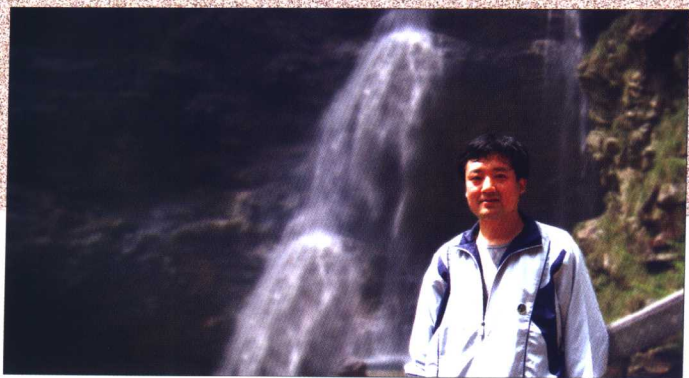
文习山	石 兢	宁津生	刘经南
李文鑫	李德仁	吴庆鸣	何克清
杨弘远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易 帆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谈广鸣	蒋昌忠	樊明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顾海良
副主任委员 ▶ 胡德坤 黄 进 周茂荣
委员 ▶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谭力文	

秘书长 ▶ 陈庆辉



申万里

1965年8月出生于山东嘉祥，1996年考入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中国民族史（蒙古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99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元史方向博士研究生，2002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2002年7月应聘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工作，先后任讲师、副教授。2005年以来在武汉大学做在职博士后研究至今。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元史、中国古代教育史。2003年以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教育研究”（目前已经结题，评为良好等级）、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元代江南儒士群体研究”。2003年以来，在《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内蒙古大学学报》、《暨南史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元代游学考》、《宋元乡饮酒礼考》、《元代庙学考辨》、《元代以学官选注巡检考》等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两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转载。

内 容 提 要

元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元朝处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之下，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独尊的地位，科举制度亦长期废置。因此，元代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生存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士大夫集团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问题。

本书首先以蒙古人接触并逐步理解中原文化为切入点，通过蒙古征服给儒学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化，揭示蒙元王朝文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其次，本书通过史料统计的方法，考察元代教育的发展过程，通过统计数据，描绘出元朝教育发展过程的轨迹曲线。再次，本书全面考察了元代教育制度。元代加强了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管理制度。祭祀制度是元代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元代儒学的祭祀制度包括春秋祭丁、朔望祭祀以及殿谒等内容，还包括地方举行的乡饮酒礼等。元代教育形成了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学体制，元代教育在继承前代经学教育的同时，人才的培养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第四，本书考察了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结构与学产。元代儒学的建

筑布局呈现出庙学合一的特点。一般学校都由庙、学和教学辅助设施三部分组成，存在前庙后学、右庙左学、左庙右学三种形式。元代的学产除了学田以外，还包括祭器、书籍、房产等。有元一代，儒学学产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第五，本书考察了元代学官制度。元朝统一以后，逐步规范学官制度。元代学官主要来自儒户家庭，其收入尚能维持温饱，但是由于受到儒学运行状况和学官升转困难的影响，元代学官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元代江南学官仕进非常困难，北方学官的情况则相对优越。从社会网络的构建来看，元代学官非常注意利用社会网络改善自己的处境。

元代教育既有对前代传统教育的继承，又有在蒙古统治的特殊条件下，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进行的调整。元代教育的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在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学校建设、教育管理等许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总的来看，元代教育在教育对象的扩展、教育大众化、教育机构的广泛分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教育面向下层社会，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扩散，社会文化的普及意义重大。

目 录

探索元代文化教育发展的特殊路径（代序）	李治安 1
绪 论	1
第一章 蒙元政权的建立与文教政策	17
一、蒙古政权与儒学	18
二、蒙元王朝的文教政策	30
第二章 元代儒学教育发展考察	48
一、元代儒学教育发展情况	52
二、元代特殊地区儒学教育发展情况考察	79
三、元代的社学	89
四、元代的义塾	95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一）	148
一、有关“庙学”的考辩	150

二、元代儒学管理制度	159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二）	187
一、元代以前中国地方儒学祭祀制度回顾	188
二、元代儒学春秋祭丁制度	191
三、元代儒学朔望祭祀制度	204
四、元代儒学的殿谒（或庙谒）制度	216
五、元代儒学的乡饮酒礼制度	220
第三章 元代教育制度（三）	246
一、元代儒学小学教育	246
二、元代儒学大学教育	255
三、元代儒学生员的数量与待遇	267
四、元代儒学生员的游学	271
五、元代儒学生员的出路	290
六、元代儒学教育制度的特点	293
第四章 元代儒学的建筑布局	297
一、元代儒学的主要建筑类型及功能	298
二、元代儒学建筑布局	327
三、元代儒学建筑布局的变化	334
四、元代书院的建筑布局	340
第五章 元代儒学的学产	348
一、学田	349
二、祭器	356
三、书籍	358
第六章 元代学官制度（一）	363
一、蒙元前期的北方学官	366
二、元代江南学官群体的形成	368